

目 录

- 序 吴义勤 (1)
- 导论 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1)
- 民国时代的社会图景和内在精神——社会生活最为动荡、政治局势最为混乱、价值观念最为多元、历史地位最为特殊——小说创作受制于文化语境、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不断变易、民国叙事先天地与意识形态相关联——作家主体与叙述对象的交互作用——当代小说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 第一章 革命星空的覆盖与存留 (1949—1966) (13)
- 一、言说民国的时代语境 (14)
- 新中国的创立——确认了民国时代的基调与中心——写作的职务化——“补正史之阙”的传统文学资源——现实社会中的文学批评——民国叙事规范化
- 二、革命主题对民国时代的简化 (23)
- 意识形态的要求——革命主题的强化——革命主题对社会构成的简化——革命主题对爱情的整合——

- 革命主题对苦难的指认命名——革命主题对死亡的解释与提升
- 三、隐形叙述的客观化效果 (35)
超空间性——顺时序性——隐形性——客观化的历史
- 四、独特个人记忆的存留 (42)
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感性生活形态的存留——获得最低限度的审美意蕴
- 五、感性生活向革命主题的靠拢：《红旗谱》 (48)
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农民革命的自发阶段——脯红鸟风波：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的展开——痛失宝地：冯严两家阶级矛盾的激化——反割头税运动：农民斗争取得胜利——二师学潮：学生运动高涨——显示出感性生活形态向革命主题靠拢的迹象
- 第二章 英雄话语的纯粹与迷失 (1967—1976) (57)
- 一、向“样板戏”模式看齐 (57)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倾斜——中国戏剧（包括戏曲）自身的传统与特性——“棍子式”的文艺批评——“样板戏”模式的确立——民国叙事小说向“样板戏”模式靠拢
- 二、英雄话语的纯粹 (63)
塑造工农兵英雄的根本任务——剔除有碍主题表达的杂质：民国时代含混复杂的社会状况、人生应有的无法言传的况味、个人的生理情感需要——纯粹的英雄话语
- 三、客观化叙述的无效状态 (74)

故事时间的单向性——情绪化的超空间性叙事—— 以领袖语录为叙事逻辑——违背生活本身的逻辑 ——打破“仿真”的叙事效果——叙事目的全面 失效	
四、民国时代精神的迷失	(81)
小说艺术特质的失落——新旧混杂的民国时代—— 工农兵成为阶级的代言人——民国时代的内在精神 ——封建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复杂关联与转换——迷 失在英雄话语的纯粹之中	
五、完美英雄与末路英雄的对照呼应	(87)
完美英雄是工农兵人物形象——末路英雄是将官人 物形象——胜利者因狂喜而傲视一切——失败者痛 定思痛中的苦涩回味——文化语境对文学创作的切 实影响	
第三章 反思之光的烛照与遮蔽 (1977—1984)	(95)
一、批判“文革”的时代主潮	(95)
对“文革”的反拨——意识形态的意图——作家的 内心需要——批判反思“文革”——怀念革命战争 年代——反思不彻底	
二、反思之光的烛照与遮蔽	(102)
塑造阶级身份暧昧的人物形象——寻找民族生存之 根：民众为革命默默奉献——对革命追求的质疑被 遮蔽——恢复民国时代的含混复杂——超越“样板 戏”模式——文学的本体性被遮蔽	
三、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对客观化历史的冲击	(113)
“文革”时期的生活体验——电影蒙太奇手法和意	

识流小说的引进——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打破客观化历史——显示历史的延续性、相似性和言说性

四、在主潮之外…………… (119)

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长期存在——文学创作的惯性延续——民俗文化小说的出现——与反思主潮共同构成文学的生态环境

五、民族精神的颂扬与偏失：《黄河东流去》…………… (125)

颂扬吃苦耐劳品格——未能客观看待吃苦耐劳的成因——吃苦耐劳只体现在下层民众身上，割断了文化的普适性——颂扬重情仗义、团结互助的精神——未能客观看待重情仗义的成因与影响——对伦理道德文化的负面价值挖掘不深

第四章 模式消解的极致与限度 (1985—1991)…………… (136)

一、对历史叙述的怀疑…………… (136)

西方当代史学观念的引进——历史行程的迂回曲折性——作家自身的独特经历——抛弃既有历史观、文学观——完全颠覆民国叙事的经典模式

二、消解经典模式…………… (141)

故意涂抹阶级界线——强调人物行为选择的复杂动因——强化历史的破碎与偶然——彻底打破经典模式的阶级革命叙事

三、显形叙述的主观化追求…………… (152)

后设叙述：叙述脱离故事而独立——空缺叙述：打破故事的完整性——主观叙述：“我”在历史中漫游，显示出历史的叙述性——改变了历史叙事的传

统模式

- 四、颠覆者的宿命…………… (161)
 颠覆经典是经典另一种形式的影响——局限于“前文本”的固有层次——未能表达出对民国时代的个性化理解——艺术形式上的实验性质——离艺术的成熟尚有一段距离
- 五、对阶级革命与历史真实的双重质疑：《大年》 … (166)
 革命主体的自私堕落——革命对象的乐善好施——革命引路人的阴险狠毒——革命话语不攻自破——历史与叙述的错落——历史真实的空缺状态——历史决定论受到质疑
- 第五章 大众视点的扫描与着色（1992—2003） …… (174)
- 一、大众视点的确立…………… (174)
 市场经济的影响——消除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差别——作家以大众视点观照历史——迎合大众趣味——当代小说发展的内在逻辑——日常叙事的兴起
- 二、民国时代的生活形态及其民众心态…………… (178)
 民众的日常生活上升为作品的基本元素——民族精神特质的发现——以大众的价值观念来看待民国时代的风云
- 三、后设叙述的有效应用…………… (191)
 第一人称后设叙述：将民国放入整个 20 世纪考察——传统叙述加后设叙述：呈现民国历史的复杂性——传统叙述方式：展示历史的循环性
- 四、大众趣味的着色功能…………… (199)
 商业利益的考虑——迎合大众趣味——注重民国叙

事的通俗化——强化色情、暴力与神秘内容——与
从属于政治的民国叙事殊途同归

- 五、民众生活形态及文化心理的盛宴：《白鹿原》 … (203)
民众为生存而挣扎——土地情结、生存教育、疏远
政治——个人、家族争斗表现为脸面的捍卫与挽回
——农民的深层文化心理——文化重建的艰辛

第六章 个体存在的展示与传递 (1998—2003) …… (213)

- 一、世纪末的文化语境 …… (214)

市场的喜新厌旧——人们体会到自身的渺小无力
——读者趣味的毫无定性——作家反观个体的存在
状态——人在历史情境中的无能为力

- 二、历史境遇中的个体存在 …… (216)

普通百姓：随波逐流——世家子弟：无力回天——
红色知识者：难逃政治樊篱——最后的胜利者：家
破人亡——个人的无能为力

- 三、“我”和主人公的故事一体化的叙述方式 …… (227)

第一人称他叙——主人公存在于他人的回忆讲述之
中——显得真实亲切——能够客观审视——突出主
人公存在的被动性

- 四、爱情力量反衬下的历史情境 …… (232)

爱情成为了自身——迸发出难以遏制的力量——对
自身的历史境遇无能为力——反衬出历史情境的强
大粗暴

- 五、民国时代的背景化 …… (236)

抛却民国时代被赋予的意义——恢复民国时代的动
荡面目——对民国时期的人们给予理解——注重动

荡时代给个人命运的影响	
六、历史的花腔化和个体的被动性：《花腔》	(242)
历史真相的不可企及——历史在讲述中呈现出不确 定性——主人公的遭遇带有极大的被动性——主人 公的被讲述显示出个体存在的被动无奈	
结语：遗憾与期盼	(252)
参考书目	(258)
后记	(261)

序

吴义勤

任现品于 2000 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做我的博士生，在此之前，我对她就已很了解。她在苏州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时，我也正在苏州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位朴实、勤奋而好学的研究生，她的老师和同学都对她的赞赏有加。毕业后，她分配到山东烟台大学工作，不但学业上大有长进，而且开始转向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很有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的论文。因此，当她 2000 年以优异的外语和专业成绩考取我的博士生时，我对她的学术前途很有信心，也充满期待。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博士生的单一学术结构能有所改变，我觉得，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等过细的学科划分极不利于高素质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让文艺学的硕士生读现当代文学博士，或者让现当代文学硕士读文艺学的博士，是我比较认同的一种“跨学科”的设想。我以为，这种“互补”的方式可以

既改变博士生的知识与学术结构，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成才率，也能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学科的融合与发展。而任现品可以说正是实践这种学术设想的理想人选。

入学三年来，任现品在我的要求下花大力气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恶补”了在文本占有方面的不足，同时有意识运用文艺学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进行评论和阐释，学术自信大为增强，学术优势也很快体现了出来。她的文章学风严谨，既有理论深度和方法论新意，又紧密结合文学文本和文学实践，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读书期间，在《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评论》青年学者专号等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均有高质量的论文发表，显现了很强的学术实力和学术潜力。而她的博士论文《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则更是她学术水平和学术风格的绝好体现，是她三年勤奋努力的最好回报。

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历史的叙述可谓由来已久，“民国历史”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对象和资源，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本身。这里面，既有着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着文学自身的原因。从对“民国历史”叙述的变化来观照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是一个很有勇气和胆识的选题，它面临着挑战和困难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历史、政治、传统、文学惯性、意识形态甚至以往的文学史叙述等等，都会增加作者研究的难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作者能顺利完成这样的研究，就不仅会拓展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而且还会改变中国当代小说甚至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启示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任现品勇敢地面对了这个挑战，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标。

在这本博士论文中，她首先对建国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进行了全面的重读，其阅读量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对50年代和“文革”期间长篇小说文本的重读，构成了论文的一大特色。其次，她对中国当代小说中涉及民国叙事文本的重新阐释也极有创见和新意，细腻的学术感悟、敏锐的学术洞察以及正本清源的学术勇气构成了论文学术创新的基础。再次，论文从理论上对不同历史阶段“民国叙事”的形态、特征和话语、修辞风格等进行了有深度的概括与总结，特别是对“英雄”、“爱情”、“革命”等主题话语的阐释尤显智慧和胆识，从一个新颖的角度重塑了中国当代小说史的形象，代表了在此领域研究的最新、最前沿的成果。正由于作者的卓越努力，论文在答辩时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并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现在，经过一年多精心的修改和扩充，《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即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付梓出版了，与此同时，作者也踏上了赴苏州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之旅，我为任现品感到由衷的高兴，祝她有更好的前途，更大的学术成就，也期盼她未来的学术道路更辉煌。

任现品嘱我为她第一本书写序，写下以上文字，权以充之。

2004年国庆于山东师范大学

导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历史的任何实践行为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发生和存在的，文学活动也不例外。中国当代小说，作为既定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更是不可避免地与文学内部结构以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历史背景、传统文化、作家自我身份意识等相关联。而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况为主体内容的小说，则更是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国叙事体系。对于这类小说进行全面的考察与把握，是一项异常复杂的工作，其复杂的程度不仅来自于一个浩繁的叙事话语系统，而且来自于中国大陆 50 年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运作过程以及两者之间交织错结的密切关系。当然，这种复杂也向批评家们敞开了极富诱惑力的探索空间。

特雷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中说：“任何解释活动，至少涉及到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解释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

种相互作用。”^①这三种现实、三种因素是互相关联的。具体到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一个因素是书写叙述对象，即民国时代的社会图景和内在精神；一个因素是观照、书写主体，即当代小说作者；第三个因素就是认识对象和主体之间的关系。

就第一种因素而言，作为被叙述的对象，民国时代的历史事件本身带有非常复杂的多面性，或者用特雷西的概念，叫做历史的“含混性”，这导致了阐释、叙述的多种向度和多种可能。首先，民国时期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生活最为动荡的历史阶段。1911年的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一方面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脱离了旧有轨道，陷入混乱状态。中华民国甚至一度被袁世凯所窃取而复辟帝制，随后的北洋军阀更是浑水摸鱼；“民国初年，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②各派军阀以实力为后盾，以利害为核心，又夹杂以宗族观念和地方主义，既联合又拼杀，既勾结又提防，使权力纷争的结局变得愈益扑朔迷离。即便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中央有蒋汪两大派的明争暗斗，地方有各割据势力之间的争夺，仅1932年蒋介石的统一军制就引起数起火并，“1932年4月，广东省主席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与海军司令陈策两派之间首先发生冲突；同年9月间，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陆军总指挥韩复榘与驻胶东的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发生了激烈的战事；继而四川两实力派刘湘、刘文辉发生争夺统治权之战；新疆也发生盛世才、马仲英

^① 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冯川译，1995年版，第21页。

^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之战等等。”^① 再加上其中还贯穿着国共两党为敌为友的关系演变和日本得寸进尺的对华侵略活动，更是把民国时代的动荡混乱推向极致。

其次，民国时期是中国有史以来价值观念最为多元的历史阶段。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虽被推翻，但与之相适应的宗族观念、乡土意识、权谋思想并未随之灰飞烟灭；同时伴随武装侵略而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也在一定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一时间长衫马褂与西装革履、占卜算命与科技学术、纳妾嫖妓与恋爱自由同存共在，生活形态土洋并存，价值观念多种多样。仅以交通工具而言，上海“有乘各式汽车、马车、电车者，有乘轿者，有徒步者，有男女携手同行者，有男女同车左拥右顾急驰而过者”。^② 在这种大动荡、大转型的年代，充斥着各阶层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死苦乐、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等，从而共同构成一幅含混的变幻不定的历史图画。普通百姓则为在乱世中活命而各尽所能，有为养家糊口而跑去当汉奸的，也有上山当土匪的，当然也有人发财、纳妾等不一而足。“军队不忠于国家，原因在于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家卫国，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③ 个人生存需要与民族生存需要的纠结交错，更使人们的行为选择复杂多样。民国时期的种种政治势力、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含混存在，随着1949年10月1日的到来而最终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民党的远

①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3页。

② 王建中：《民国风俗演进的时代特征》，《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

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走台湾成为 38 年动荡的直接产物。

最后，民国时期在当代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民国时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以强调文化的转型性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民国时期作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生活等）都在急剧地发展、变化着，是这段历史时期的总态势和总特点。”^①这也决定了民国时代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政治、文化问题的症结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转型变化中找到源头，其对现代性的追求与误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依恋、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与排斥、对民族前景的设想与盲动等都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所有这些都使当代作家一遇到现实问题就把思索的目光投向民国，以期在对民国的叙述中理解现实。正像亚斯贝斯所说的那样，历史的回忆构成了人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在许多人那里，历史是今天的解释、补偿、映照，阐释现状常常是历史研究的潜在动机。克罗齐说过，“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以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假如它与现实生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话。”^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现在的历史”^③——克罗齐这个大胆的论断赢得了相当

① 朱汉国：《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及其特征》，《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1 期。

② 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93 页。

③ 克罗齐：《历史的理论和实践》，引自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522 页。

广泛的反响。说到底，文学叙事是对时代的一种理解方式，这种理解当然也包含对自我以及对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进行重新叙述。人们讲述历史，目的是找到现实的起源；而每一次的寻找，都不可避免地构成对历史的重述，因而也是历史的断裂。

当然，作家集中回忆、叙述民国时代这一段历史，似乎隐含了某种精神分析学上的原因——这一段历史犹如当代中国包含创伤的童年经验。海登·怀特说过：“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总是着手分析他们文化中的‘精神创伤’性质的事件。例如革命、内战、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类的大规模的程序，以及丧失原有社会功能却仍继续在当前社会中起重要作用的制度。”^①很大程度上民国叙事处理的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进程中带有“精神创伤”性质的事件。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20世纪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随着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新时期改革开放三次历史巨变，中国社会开启了从传统全面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②民国时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起步阶段，因此人们有理由提出：这个时代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它的童年经验，对此不同阶段的作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历史无法逃避自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随着新的当前的出现，过去就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③ 尽管我们今天还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但可以

^①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② 朱汉国：《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及其特征》《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③ 约翰·杜威：《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年）第239页。转引自[美]Robert E·Spilier著《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译本序言”第7页。

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历史阶段的影响与意义将会被更加充分地揭示出来。

就第二种因素而言，作为认识主体，中国当代小说作家具 有极大的非自足性，其对民国时代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对作家来说，小说是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当然这种经验既包含直接生活经验，也包含想象性经验，但经验本身、社会生活本身并不直接构成小说，并不构成一定的意识形态结论。作家对经验的呈现与传达既不是“镜子式”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游戏式”的那样无功利。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合乎目的性的，小说写作这一高级的人类文化活动是通过人类经验的再现来观照人本身，为人类特定生存状态、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寻求观念上的依据和理由，以自身特殊方式进行辩护和拷问。但是，从圆形立体的民国时代中选择怎样的人类经验进入文本（题材）和如何叙述这些经验（题材的开掘与呈现形式），即得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结论则主要取决于作者、取决于叙事者的历史眼光、文学观念和文化态度（它决定叙述人的主体定位和叙述方式）；而这一切都最终与作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虽然作者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和具体的叙事发生直接关系，但是却对作家“怎样叙事”和“叙述什么样的故事”具有规范作用，体现了一种文化选择，所以称其为文化语境或深层的、“不在现场”的语境。它和文本自身构成的语境，即由小说的事件、情节所构成的语境，共同制约着我们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只是这种语境很可能甚至不为言说者本人自觉，可实际上它却决定着 一个作家将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营构他的小说，决定着他对题材的理解和评价以及如何言说故事，因此也决定

着他试图给这个故事赋予什么样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这种语境生成于言说者所属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它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结构之网，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与历史的观照，更通过语言渗透于人的感知、思维乃至潜意识，在冥冥之中操纵和规范着作家的运思和言说。因此，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本文，我们在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时，应该注意到作家的言说实际上既与文本表层语境密不可分，更受制于深层文化语境。对本文意义的把握，只能在顾及两种语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强调深层语境的存在是为了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小说家的言说，都有既定的文化结构在背后为他支撑。这种结构从构成上讲，包括了文化传统、人生观念、语言规则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态度等等因素。而从作用上讲，影响言说的文化结构又是一种机制、一种规范，它使人们的言说无论自觉与否，都带上了隶属于一定文化的倾向性，从而成为福柯所谓的那种“话语”，即具有某种“权力”意味、渗透了某种价值观念的语言。语言作为一套既成的符号系统，正像萨丕尔所说，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① 因此被深层语境所规定的文化意味往往会在不为人知的非自觉状态中通过语言融入言说，成为文本意蕴的一种构成因素，一种或许在主体言说意图之外然而实际上对文本意蕴发生影响的构成因素。当代作家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它根本不可能是对史实的客观叙述，而是带有相当浓厚的语境色彩。

^①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8页。